

阿拉法特传(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人物传记
书 名：阿拉法特传(下)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4-5/1247
定价：10.00元

第三编 斗争

第十五章 阴谋四伏和在约旦的灾难

在 1970 年 9 月 15 日，约旦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拜会了侯赛因国王。这些代表人人都是强硬的反巴勒斯坦派。这次会见是应这些将军们的请求而举行的。他们对国王说，如果他不下命令消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他们将把他软禁在他的住处，并且无需他的准许而自行其是。侯赛因后来对我证实了这件事。

按照西方报道的说法，在约旦的这场双方内战是为决定谁统治约旦而战的，是侯赛因还是阿拉法特。事实上，约旦危机的发展表明，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实际上是站在一边的。两人都在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避免由他们自己的极端分子挑起的一种全面对抗。两人都很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同时在积极活动，在尽他们各自力量以确使在解放运动内部的一场危机变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场灾难。

如果必须要把它归纳为人的因素，那么导致内战的对抗实质中的真正问题，在于谁统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乔治·哈巴什。但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它也不真正是人的问题。

解放运动中的分歧在于政策。阿拉法特代表领导层中的某些人，他们认为解放运动必须同阿拉伯前线国家一起干，即使这些国家准备同以色列媾和。哈巴什则是那些赞成采用革命方式的人的领导人，他们认为革命必须从约旦开始，通过激发对抗以打倒侯赛因。导致内战的对抗不是发生在整体的均一的巴勒斯坦运动和约旦政权之间。它发生在这一运动中的一翼——就人数来说，是巴勒斯坦活动分子的一个小小少数派——同约旦政权之间。事实是，阿拉法特在他成为巴解组织主席之后不久，失去了在他自己一方对事态的控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对这场既非阿拉法特也非侯赛因想要的内战，阿拉法特在处理巴解组织内部分歧和危机方面应当受到多大指责呢？阿拉法特应当使用法塔赫占有巨大优势的军事力量去镇压那些正在挑起同侯赛因政权对抗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左翼分子吗？就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人数来说，他们是一个少数派。

当侯赛因回忆紧接在“六天战争”之后在大马士革的阿布·卡马尔饭店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的情景时，他说，“从第一次谈话来看，显然，阿拉法特同我对如何在阿拉伯失败后的新形势下指导我们的解放斗争，有着很不同的看法。”

在 1967 年底，哈巴什和其他相信他们能将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应用于斗争的人们组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人阵是由哈巴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艾哈迈德·贾布利勒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发起的两个小游击组织合并而成。贾布利勒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是为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服务的一个阵线。过了一段时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再次分裂。按照大马士革的指示，贾布利勒从人阵分裂出来建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总部）：纳瓦夫·哈瓦特迈赫和他的支持者同哈巴什分裂，建立了人民民主阵线（民阵）。但是，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继续是法塔赫的主要对手和主张革命道路的首要斗士。

到了 1968 年 12 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表明，就指导武装斗争而言，它所奉行的方针与法塔赫是多么的不同。法塔赫的方针是把暴力行动限制在巴勒斯坦本土。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领导层中的同事们知道，如果他们在

巴勒斯坦以外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将与各国政府为敌，并且疏远国际公众舆论，而如果他们要推进他们的事业，他们对国际公众舆论是必须争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不同意这点。在 12 月底，该组织的两名枪手向停在雅典机场上的一架以色列客机开火。这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中东内外反对犹太人利益的一场恐怖运动的开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从此以劫持专家身份出现。这个组织的恐怖活动首领是瓦迪·哈达德医生。他经常领先作出行动，这类行动对哈巴什来说是太激烈了。当哈达德在阿尔及尔被一名外国情报人员投毒，最后在东欧死去时，哈巴什并未感到过分悲伤。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哈达德葬礼上，哈巴什在他的悼词中表示了对他的这位老同事的不满。对一些巴勒斯坦人，包括法塔赫领导人来说，这是他们所长期猜测的一个证明，即哈达德曾经迫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走上极端道路。哈巴什知道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是有害的，但是他无力制止。

为报复首次雅典机场事件，以色列人炸毁了停在贝鲁特机场的 13 架阿拉伯民航飞机。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奉命声称，以色列的报复是“一项傲慢的、不相称的行动”。以色列的做法之所以根本未能制止其民航飞机再次受到袭击，主要是因为哈达德感到他受到反对派的挑战，要显示他能做些什么。以色列的报复行为，给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当时最需要的宣传以及在—些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民眼中的一定的革命的信心。

从某种程度上讲，哈达德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中主张暴力的人是想坚决报仇。但是，他们的疯狂是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是这样想的。人阵与法塔赫不同，它不是一个真正植根于广大群众基础上的民众组织。它基本上是一个由被激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这些知识分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像落水者发现了可以紧紧抓住的漂浮物。但是，他们知道，向巴勒斯坦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共产主义同阿拉伯主义不是天然盟友。因此，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打击以色列的利益来赢得巴勒斯坦群众的注意力，然后再进行教育和灌输。总而言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认为，用这种方式，它能够同法塔赫竞争，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最终把它自己建成一个群众性组织。

但是，驱使哈巴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声称赞成革命方式的激进的个人和团体的真正动因，在于恐惧他们在谋略上被阿拉法特取胜，恐惧如果法塔赫被允许来统治解放运动，则到头来在以面对现实的名义下它将作出众多妥协，以致巴勒斯坦人将一无所获。事实上，主要目标在于阻挠和破坏在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与那些正在谋求与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约旦之间的正在发展中的伙伴关系。

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的、激进的团体在 1969 年 2 月感到惊恐，因为法塔赫在纳赛尔的帮助下参加并有效地控制了巴解组织。这一事件发生在开罗召开的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在总数为 105 个席位上，57 个席位分配给各游击队组织；在 57 个席位中 33 个分配给法塔赫。其结果是，法塔赫处于得以保证阿拉法特当选主席职务的地位。

从某种观点上看，可以说左翼的和激进的团体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法塔赫的行动自由现在是由宪章所规定的目标和政策所决定的。在理论上说，宪章是解放运动的圣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宪章规定所有巴解组织成员必须保证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彻底解放，而且这一点按照宪章中的话说，只

有在“为此问题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成员”赞成才可修改。由于反对法塔赫道路的那些人很可能在当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占压倒多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获得修改宪章的三分之二多数是不可能的。因此，阿拉法特的双手是被束缚着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法塔赫在各解放组织和阵线中是最大的、最强的，并且最受群众拥戴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执行不符合宪章的政策。正如时间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法塔赫领导人从没有公开这样说过，他们事实上没有想到要受宪章原后的约束，如果宪章的这些规定在他们看来不能为他们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的话。

在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闭会以后的几个星期，一个戏剧性的新闻出现了。它证实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最担心的事，即巴解组织的政策导向要由法塔赫掌握，而阿拉法特出任巴解组织主席。这项消息的带信人是哈拉德·哈桑。他是曾经当选为十五人的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中的四位法塔赫领导人之一。他当时任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这样，除其他事务外，他负责对外政策。哈拉德在4月返回约旦，带着他取得的第一次外交胜利，从历史角度看，也是他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外交胜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支持法塔赫，并通过法塔赫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和主张。沙特阿拉伯对法塔赫支持的重大意义不能被认为是言过其实。正如时间所证明的，法塔赫有沙特阿拉伯站在它的一边，是不可摧毁的——只要它奉行沙特人所能赞成的政策。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在安排法塔赫掌管巴解组织时，曾经问及埃及总统关于埃及为解放运动提供一些财政支持的可能性问题。哈拉德·哈桑在同我谈话时非常坦率地谈到法塔赫当时的经费困难。他说，“我们穷极了。我们有一些武器和弹药，因为中国人自1964年以来一直经常地负责地向我们提供。事实上，我们表示要向中国人付费，但是他们总是坚持我们应当把他们的帮助作为礼物来接受。但是，当我们接管巴解组织时，我们无钱支付生活费用和行政开支。老实对你说，我们甚至已无钱填饱我们自己的肚子了。”

纳赛尔无法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他建议他们在这方面应当转而寻求沙特人的支持。当哈拉德·哈桑动身去沙特阿拉伯，乘汽车、骑骆驼旅行，企图非正式地进入这个国家时，他发誓他要完286成他的同事未能在那里完成的任务。在他之前，阿布·伊亚德、阿布·杰哈德，甚至阿拉法特本人，都曾叩过沙特阿拉伯的大门。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一切是，除非国王发话，大门是不会对他们打开的。而国王现在无意这样做。哈拉德知道，他无论如何必须见到费萨尔，这是他此行的目的。

为什么费萨尔是如此不愿意接见法塔赫的领导人呢？为什么他甚至不准备听取一下他们援助的恳求呢？费萨尔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当代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上踱步的强硬分子，比这个沙特君主更狂热地反共。某些西方情报机构，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已使沙特政权确信，法塔赫领导人是共产主义分子。哈拉德说：“这完全是使我们遭受怀疑的卑劣谎言。费萨尔是一个非常聪明而机敏的人，他通常总能识破西方欺骗他的种种图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自己抱有的强烈意识，他听信他被告知的关于我们的一切，而没有产生那么多的疑问。”

哈拉德微笑着形容为在法塔赫与费萨尔之间“误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舒凯里在成为巴解组织第一位主席前后的行为和态度。沙特人从不饶恕舒凯里那些日子里成为纳赛尔的人，当时他被认为在联合国正为他们工作。当舒凯里作为纳赛尔傀儡的巴解组织的主席，号召推翻所有阿拉伯反动政权时，在沙特人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但是，现在舒凯里已不在位，巴解组织是在新的领导管理之下。哈拉德希望能够在沙特阿拉伯实现新的开端。

当哈拉德抵达沙特时，他此行拥有的唯一东西，是一位具有一个有用姓名的朋友——法赫德·马拉克。这位沙特先生是一名外交官。哈拉德说：“法赫德·马拉克 1948 年在巴勒斯坦参加过战斗。他生平一直认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是他终生的职责。他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显然，法赫德·马拉克也是在沙特王国中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事先未得到费萨尔点头同意情况下就准备帮助巴勒斯坦人。

哈拉德继续说道：“我的朋友把我带到利雅得的雅玛迈赫饭店。正如你所知道的，来访者是不允许得到房间的，除非有政府、公司或沙特公民作为保证人。饭店接待人员问法赫德·马拉克，谁在为我作保。我的朋友回答说：“法赫德”。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姓氏，也是王储（现今国王）和内政部长的姓氏。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这位接待人员以为我是王室的一位宾客！我的朋友选择了这个特定的旅馆，因为法赫德王储的许多客人都在此下榻。

“由于相信我是王室的一位宾客，他们为我安排了一个豪华的套间。在以后的 8 天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我给许多知名人士打了电话，我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人在这里。’随后，我收到阿拉法特的一份电报，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怀疑是否我已在沙漠中失踪了！”

正是阿拉法特的电报，使哈拉德产生了第一个巧主意。这位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毫不迟疑地坐下来，给巴解组织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尚未见到国王，因为国王陛下实在太忙，但预期会见会很快实现。在对费萨尔作出热情而诚挚的称赞之后，哈拉德用这样的话结束了全信：他确信“像费萨尔这样的人绝不会加害于我”。哈拉德并没有意思发出此信。他把未封口的信留在套间的写字台上，外出散步去了。他知道在他外出时会有人看到此信，信的内容会传到有关当局那里去的。“但是，我的小把戏没有成功，”哈拉德说道。仍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天或两天过后，一个偶然机会，哈拉德得知费萨尔的私人医生是一位巴勒斯坦人，此人曾在海法当过哈桑家庭医生。哈拉德和法赫德·马拉克邀请他出席晚宴。他应邀来了，哈拉德向他谈了自己的使命和他渴望拜会费萨尔的心情。哈拉德告诉我：“我被劝告向这位医生讲出一切，因为人们知道他会把我讲的每句话报告给国王。他这样做了，但是从国王陛下那里仍无反应。此后，我试图会见王室的一些亲王，但是我被十分率直地告知，没有人能帮助我，除非我见到国王。

我打断了哈拉德的故事，问他到这时他是否在开始感到他已经失败了。他回答说：“不，我仍然把我的使命看作是一种挑战。但是，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地沮丧……20 多天来每天 24 小时呆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没有书可读，没有人可交谈。简直糟透了。”

哈拉德这时十分失望，准备冒险行事。他获悉这位国王每周为各部落领袖们举行一次“非礼仪性”的会见。哈拉德说：“对来自部落的人，按照礼

仪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领袖们不受检验，径自到达，等待依次会见国王陛下。”

在这个星期规定的一天，哈拉德穿着打扮得像一位部落首领，加入了正聚集在一起等待会见的 100 名真正的沙漠之子的行列。当每一个人依次接近这位国王时，他仔细观察着。有些人向他递交请愿书并简单致词。也有人喜欢多讲话。当每个人离开时，这位国王向他的侍从低声发出指示。

突然，轮到哈拉德这位冒充者面见国王了。“我说：‘您好，陛下。我是法赫德的哈拉德·哈桑。我目前正住在雅玛迈赫旅馆，我来这里是要会见您。在我能真的会见您以前，我不会离开利雅得的。很感谢您。’然后我就走开了！”

法赫德·马拉克此时正焦虑不安地等着哈拉德。他在等待时曾闪过再也见不到他的朋友的念头。“法赫德问我，是否见到了国王。我说：‘见到了。’他说：‘你同他握手了吗？’我说：‘握手了。’法赫德问：‘他说了任何反对你的话吗？’我说：‘没有，他只是在望着我微笑。’”

这两位共谋者这时尽其所能迅速传播哈拉德受到国王接见消息。虽然事实尚不能完全证实，含意是哈拉德也已得到了费萨尔的同意。当天晚些时候，由于法赫德·马拉克的努力，哈拉德被邀请出席了在费萨尔姻兄弟家举行的晚宴。

哈拉德继续说道：“在黄昏来临时，这位国王的姻兄弟和他的客人们进行祈祷。我加入到他们的中间，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问：‘你是一个具有西方生活方式的人，你也祈祷吗？’我说：‘为什么不呢？’他们于是迷惑不解。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大笑起来并且告诉他们，我绝对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且从来也不可能是。”

在夜幕即将降临时，这位姻兄弟的兄弟有几分钟不在场。哈拉德说：“他返回时拿来了一枝加里什尼科夫来福枪和一支左轮手枪。他问我是否我愿作为礼物收下。我说，‘难道你想看见我被关在监狱中吗？如果我带着这些武器回到旅馆，我会被逮捕的。’这位兄弟笑了。他说：‘好吧，当你离开时，我将在机场把它们交给你。’我感谢他，但是说，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我携带武器抵达安曼，我会被约旦人逮捕并投入监狱。这位兄弟十分吃惊。‘这是真的吗？’他问我。我说：‘确实如此。’他更为惊奇。他说，‘你的意思难道是在告诉我你们正在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战斗而你们却不允许拥有武器？’我告诉他情况正是这样。这也正是我为什么来到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原因。接着他说了如下的话：‘我向你保证，这两支枪将同第一批装船武器从沙特发往安曼。’”

在哈拉德来到沙特阿拉伯的第 23 天的下午，他所居住的旅馆套间里的电话第一次响起了铃声。电话线的另一端的声音通知哈拉德，他会见国王的时间定在当晚 8 点。

当晚 7 点 55 分时，哈拉德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典礼局长告诉他，由于国王还有许多会见，他同国王谈话只能有 15 分钟时间。哈拉德对我说：“对典礼局长，我说：‘好，谢谢你。’对我自己，我说：‘这是荒谬的。在 15 分钟的时间里我能得到什么？答案是什么也得不到。’我很沮丧，随后，在我将要进入这位国王的房间时，某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回首观望，看见卫兵正在伸举起他们的手做出祈祷的样子，愿真主祝福我会见国王陛下成功。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我哭了。当我同费萨尔握手时，我仍在努力控

制我的泪水。”

在这次历史性会见时刻，是费萨尔而非纳赛尔是阿拉伯世界实际领袖的这一事实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广泛承认。只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法塔赫的政治对手和人数较少的其他阿拉伯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否认这一现实。纳赛尔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仍是占有特殊地位的超乎所有其他人之上的领袖。大多数普通的阿拉伯人并不真正了解以色列和西方处心积虑破坏纳赛尔在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中的机遇，他们似乎本能地以为他是一位远比环境允许他作得更好的领袖。因此，纳赛尔仍能获得阿拉伯群众的爱戴。然而，哈拉德·哈桑目前准备使之卷入的却是通过石油而获得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一位人物。

瞬间，哈拉德容许自己闪过这些相似的想法，他很快重新恢复镇静。随之他意识到所在的危险处境。如果不能说服费萨尔支持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事业，那么像哈拉德和他的同事那样的温和的、务实的人能够影响巴勒斯坦事态发展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哈拉德继续说道：“我们开始谈话后，这位国王离开他的办公桌，在长沙发椅上坐在我的身旁。由于我的心中有那么多事，要说的话又那么多，我十分焦急，因为费萨尔按照通常准则在限制着我们谈话时间，而时间又迅速流逝。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在20分钟过去后，典礼局长走进来，提醒这位国王他的下一个约会。卫兵的祝福声在呼应着。然而，费萨尔注视着我的目光却不离开，他用一只手的手指做了一个小的几乎不能觉察的姿势。这是信号，表示他不想再有任何约见。我的心情大大宽解下来。”

4个小时过后，这两个人仍在谈话，但是，哈拉德没有理由感到庆幸。他说：“4小时后，我不能从他的脸上或者眼里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我已经使他信服。我开始想我已经失败了。我还没有提出援助的特别要求。”

同费萨尔有直接接触经验的所有人，包括我本人都知道，同他详细谈话是一种考试般的难熬的经历。费萨尔从不或者几乎从不直截了当说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宁愿以寓言般的方式说话。有一次在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以后，我大胆地问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说话。这位国王流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淡笑。他通过一位翻译说了下面的话：“如果我说了错误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以错误的方式说了正确的东西，中东将起火被烧毁掉。”

午夜过后不久，哈拉德决定他必须采取主动。“我鼓足勇气，我对费萨尔说了如下的话：‘陛下，在我看来，您好像不想充当中东的统治者和救星。’他答道：‘谁说我想这样作？对我来讲，在麦加做真主的仆人就足够了。’我说：‘陛下，我的意思不是说您自己想作中东的统治者，或者控制这一地区，我是在谈论关于您的信仰和思想。’这位国王回答说：‘这同你来到沙特阿拉伯的原因有什么关系？’我意识到，这是我以环境所能允许的坦率程度讲话的机会了。

“我说：‘陛下，我们巴勒斯坦人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我们的权利而战斗，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只有左派人士在支持我们。（正如费萨尔所知，哈拉德主要指的是中国人。）这不是我们法塔赫里的人要这样。我们不想受任何外国意识形态，受任何政府或领导人所制约。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但这只有我们能从多种来源得到支持才能做到。您能帮助我们独立吗？如果您不帮助我们，我们将被迫只同那些现在正在支持我们的人在一起。’

“这位国王保持缄默，我仍然说不上来他在想些什么。我决定以一种我知道会吸引他注意力的方式来概述我的情况和理由。我说道：‘陛下，让我们假设您是在沙漠中，骑在骆驼上，带有充足的水，而我正向您走去，濒临渴死的边缘。如果我向您索水，您将给我一些水，并让我同您一起骑上您的骆驼吗？’这位国王答道：‘当然，是的，这是我们的传统。’我说：‘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在一起旅行了一段路，我向您再次索水，您告诉我，我可以得到，只要我准备为您做些事情。即使我不想这样做，我能拒绝您所要求的事情吗？’国王答道：‘也许。’我说：‘尊敬的陛下，对您要求的任何事情我不能说不，因为您将抛弃我，而我将会死去，因此，我别无选择。’国王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我继续说：‘现在，让我们设想，当您正在向我提出要求时，另外一个人骑着骆驼带着充足的水出现，这时，如果我不想做您要求我做的事，我可另有选择，因为我可以从另外的那个人那里得到水，您同意这看法吗？’这位国王说：‘是的。’最后我说：‘陛下，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不得不只从一个来源得到援助，我们将受到制约。只有当我们有许多人愿意向我们提供支持时，我们才是独立的。’”

哈拉德是筋疲力尽了。但这已无关紧要，他能说的影响费萨尔的话都说了。在随之而来的静寂中，哈拉德注视着这屋里的那位第三者靠紧这位国王，这位第三者是拉什德·法龙，他是费萨尔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按照哈拉德的记忆，这最后几分钟的谈话进行如下：

费萨尔：“拉什德，给予哈拉德他所要的东西。”

哈拉德：“不，陛下，首先我要从您这里得到一些东西——然后再从拉什德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

费萨尔：“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哈拉德：“我希望您对所有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一项解放税，该税占他们工资的5%。”

费萨尔：“同意。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需要从您个人那里得到一些列名的财政支持。”

费萨尔：“可以，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也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一项列名的财政支持。”

费萨尔：“一年1200万美元够吗？”

哈拉德：“那是足够了。”

费萨尔：“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需要武器和弹药。”

费萨尔：“可以。拉什德，你去进行必要的安排。务必使哈拉德得到他们需要的而我们可能提供的任何东西。”

第二天，哈拉德会见了一位沙特高级陆军军官。就这一次，这位非凡的巴勒斯坦人可就力所不及了。“我对这位军官说：‘你瞧，我不是一个军人，我不了解武器。但是，我们是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武器和弹药。您能否为我开列一份适用的武器、弹药的清单并说明从那里可以得到它们吗？’这位军官说：‘当然可以。’他制定了这份清单，我把它交给了拉什德。第二天就获得同意。”

哈拉德回到安曼。“两个星期之后，”他说，“28辆大型沙特陆军卡车载着武器和弹药抵达。沙特人把它们分发给遍布在约旦各地的我们的基地。他们曾经在利雅得给我的那支加里什尼科夫来福枪和手枪，也送给了我本

人。”

哈拉德第二次会见费萨尔是在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哈拉德说：“我最后一个同这位国王道别，以示敬意。我对他说，‘陛下，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瞧，哈拉德，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你们所代表的事业。因此，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他停顿了一下，随后补充说道：‘但我必须告诉你，人民在他们的前额上有成功的标志。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费萨尔此后活了6年。在此期间，没有人比哈拉德·哈桑同他保持着更密切的关系。哈拉德同沙特人没有密约，没有交易合同。正如哈拉德所说的，“这不是沙特人的工作方式。”但是，在哈拉德同费萨尔之间，随后在哈拉德同费萨尔的继任者之间，未明言的协议是，只要法塔赫控制的巴解组织倡导沙特人所能支持的、不破坏他们同美国特殊关系的政策，沙特阿拉伯会竭尽全力以政治手段推进巴勒斯坦事业，不管谁试图摧毁它，沙特都会站在巴解组织一边。

巴解组织新的主席利用费萨尔赠送的武器弹药，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逐步升级。他必须这样做，除非同犹太国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妥协方案取得进展。按照以色列人的记载（他们的统计要比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惊人宣称较为可靠），恐怖主义的渗透活动和事件在1967年为97起；在1968年为916起；到1969年则为2432起。在这3年中，以色列的伤亡人员先后为78人，273人和243人。

在一个10分的比例尺上，可以说阿拉法特使冲突逐步升级达到3分。以色列人的回答则使冲突逐步升级达到8分。（10分表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在1982年夏围攻贝鲁特。）直到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主席前后，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行动的回报满足于来一还一，或者多半是在许多行动后发动一次攻击作为报复。以色列人以这两种方式之一作出反应。到1969年初，这项政策被放弃了。为了反对阿拉法特逐步升级，以色列人采取了一项新的“积极自卫”政策。它的实际含意是以色列人不再满足于作出反应。从此以后，无论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出现在哪里，以色列人都对他们发动进攻。

同轰炸（主要用空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的基地一样，以色列也袭击约旦的一些极重要的设施。例如，在6月，以色列突击队破坏了东古尔水渠，这是美国人援助约旦和约旦农民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样品。在8月，这条水渠刚刚恢复，以色列人又加以破坏，致使约旦最好的500平方英里农业土地上的水果和蔬菜烂掉。以色列的这些恐怖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迫使侯赛因控制并击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

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以色列组织之间的对抗在一条战线上逐步升级的时候，它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1969年初，阿拉法特派遣他的500名游击队员进入黎巴嫩南部，命令他们准备从那里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出于我已经说过的原因，法塔赫的领导人不愿使黎巴嫩卷入战斗；但是，在1969年，他们考虑到已别无选择，正如阿布·杰哈德所解释的：“由于以色列在约旦如此猛烈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变通做法。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采取相应行动。当以色列人弄得我们在约旦呆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越过黎巴嫩边界发起一些战斗。”巴勒斯坦这些小人物1967年在阿拉伯世界主动行动带来如此灾难性后果后，纳赛尔再也没有允许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从

埃及土地上向以色列发起袭击。

在 10 分比例尺上，阿拉法特沿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界使对抗升级达到 2 分左右。以色列用大炮猛击、空中袭击和被称为搜索—摧毁行动的偶然的小型入侵，使对抗升级达到 6 分。正如在约旦一样，以色列使用它的庞大的优势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打击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而是以军事手段企图说服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不向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提供庇护所。以色列的另一个目的是说服贝鲁特政府采取行动。

以色列决定对在黎巴嫩南部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发动战争，导致阿拉法特的战士和黎巴嫩军队之间经常的、日益严重的冲突。在幕后，正如纳赛尔当时告诉阿拉法特及其他法塔赫领导人一样，他请求贝鲁特政府保持克制并给他以更多时间。据法塔赫领导人说，纳赛尔告诉黎巴嫩人，他和侯赛因正在竭尽全力劝说美国迫使以色列作出必要的撤退，以谋求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实现和平。纳赛尔还对黎巴嫩人说，他有信心，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将不会阻挠这样的和平，并且会同意为实现和平将采取政治方式继续战斗。

一些美国人在开始听取侯赛因、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意见。所以当这位埃及总统告诉黎巴嫩人他们的克制也许会得到报偿的机会时，他没有加以夸大。

从 1969 年初开始，纳赛尔和侯赛因曾表演一种双重行动向美国施加压力，以促使以色列撤回到它在“六天战争”前夕所在的边界之内。纳赛尔在进行射击，侯赛因在从事谈判。

3 月，纳赛尔向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开火，发动了后来所称的他的消耗战。它持续了 16 个月，实质上是一场限于大炮和坦克的火力交往的静态的战争。自然，以色列领导人把纳赛尔的行动说成是再一次证明他是和平的敌人。但是，正如以色列领导人所了解的，事实完全相反。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加温，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他们他仍然能够伤害他们，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他们认识到他们也需要和平。第二个信息是对美国人的。对他们，纳赛尔在转达阿拉伯人的沮丧心情，并警告美国政府，除非他们利用他们的影响迫使以色列实现和平，否则战争的趋势会继续发展。

4 月，侯赛因去华盛顿向美国人转达同样的信息，但是，这是通过正式的外交方式。正如这位国王后来向我证实的，他强调，他和纳赛尔及多数其他有关的阿拉伯领导人都非常愿意和以色列媾和，但是，他和其他希望和平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无法公开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以色列至少承诺撤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线。

在侯赛因刚刚离开理查德·尼克松之后，这位总统说：“我们要开始帮助这位国王。我们不能让美国的犹太人制定政策。”不幸的是，还得经过五年，尼克松才懂得，阻止以色列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来指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是真正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多么重要的事，但是，到那时，这已经太晚了——尼克松被卷进了水门事件。

在 1969 年，应该成为主管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人是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正在试图尽他们最大努力来拟订一项纳赛尔、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

引自塞莫尔·姆·赫什：《基辛格：权力的价值》（费伯和费伯出版公司，伦敦，1983 年），214 页。

所能够接受的和平计划，它将赋予 242 号决议以实质内容和意义。不幸的是，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和他的思想正在被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所破坏。

当时，基辛格反对任何要求以色列人放弃其所占领土以换取和平保证的倡议。很明显，任何一个对局势持理智看法的人都认为，没有以色列至少承诺撤退，就不可能有和平。必须指出基辛格在当时就是反对和平本身。基辛格的观点是，以色列的撤退，或者即使以色列愿意讨论撤退，将成为阿拉伯（主要是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左翼分子的胜利，他们的恐怖袭击那时会被看作是是正确的。这也会成为重新武装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人的胜利。如基辛格完全无视苏联承诺以色列在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内的存在这个事实，他似乎也不能把握这一局势，即以以色列不作出撤退的承诺，这就为所有各种阿拉伯和穆斯林极端主义的生长创造条件。哈拉德·哈桑作为阿拉法特和所有他的法塔赫同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代言人，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不得不说的第一件事是基辛格毫不理解在中东发生的事。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并不想去理解。对基辛格来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只不过是全球棋盘上的小卒子。对基辛格来说，关系重要的棋手则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那些人。除此之外，基辛格被两种思想所迷恋。其一是，他，基辛格，是西方最卓越的人物。我猜想他在入睡时会告诉他自己，如果美国人真是明智的，他们总有一天会选他当总统。不管怎么样，他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个人权欲。其二是，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包括在中东发生的种种麻烦，背后都有苏联人插手。我本人不认为基辛格真的相信这种胡言。我认为，他是在宣扬，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他是美国军事工业联合公司的使者和俘虏。那些控制公司的人是他的真正的后台，他必须说出他们所要说的话，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如果你要我非常直率地说，那我愿再讲一点：我认为基辛格是一个政治娼妓，更明白他说，如果他为他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作所为而憎恨自己，我不会感到惊讶。以后我愿向你证明，他还是一个可怕的说谎者。”

在 12 月 9 日，国务卿罗杰斯草拟了他的计划纲要。它要求埃及同以色列媾和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沙漠撤出，除此之外，罗杰斯呼吁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谈判，以最终达成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西岸换取和约旦媾和，并解决耶路撒冷未来归属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由于罗杰斯和他在国务院中他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就确信，纳赛尔在他私下表示的谋求和以色列媾和的愿望是真诚的，美国计划的要点一个月前就被转达到开罗。纳赛尔告诉华盛顿，尽管他欢迎这一迹象，即美国终于想方设法来对付在阿拉伯前线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的真正障碍——以色列占领在“六天战争”中所强占的阿拉伯领土——他不能和犹太国进行单独媾和。换句话说，正如他也对美国人和后来对法塔赫领导人所说的，纳赛尔希望有一个为求得全面和平的美国计划——全面和平换取全面撤退。侯赛因是失望的，因为罗杰斯计划没有把以色列从西岸撤退作为和约旦谋求和平的一个条件；但是，他对纳赛尔本人的保证感到满意，埃及将不走单独媾和的道路。

以色列的反应是迅速的和可预料到的。果尔达·梅厄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罗杰斯计划遭到拒绝。以色列对第一个罗杰斯计划拒绝的仅有的得益者，是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赞成革命方式的那些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和激进团体。他们现在在损害法塔赫现实主义者的情况下

开始挣得大量政治和宣传资本。

虽然阿拉法特及其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没有公开说过，同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一起工作是他们的政策，即使在阿拉伯前线国家同以色列媾和的情况下，他们也准备以政治方式继续他们的斗争；对那些赞成革命方式的人来说，这是明明白白的，确实这是法塔赫的政策，而它无意为宪章所束缚。以色列对第一个罗杰斯计划的拒绝，意味着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可以指责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并向他们提出一些麻烦的问题，加以质询。他们争辩说，阿拉伯政权设法劝说美国人去做的就是制定这样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忽视了巴勒斯坦人的正义要求。以色列人加以拒绝；美国人像通常一样屈服于以色列，而阿拉伯政权则对此难以作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傀儡。武装斗争和革命是解放的唯一道路。

在以色列拒绝罗杰斯计划的日子，法塔赫的领导人很清楚，那些赞成革命方式的人的论点正说到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心里。甚至许多法塔赫的忠诚战士也开始说，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蛮有道理。现在不是有充分理由可以用推翻侯赛因的办法在约旦开始这场革命吗？

法塔赫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的是，他们被指责出卖给那些要同以色列媾和的政权。这种担忧的迹象在以色列拒绝罗杰斯计划后不久召开的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明显地流露出来。这次会上最突出场面是哈拉德·哈桑和纳赛尔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哈拉德告诉我：“在读到一份正式声明后，我说，我不认为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试图同以色列媾和的任何理由。我说，这是明白的，以色列人拒绝一切，他们宁要土地不要和平。我向纳赛尔建议，他应放弃谋求政治解决，而应团结阿拉伯人去战斗。纳赛尔大怒。他扔下他的文件，离开了会议室——但是，这不是发生在他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之前，不是发生在他说团结这种东西在阿拉伯世界将永远不存在这样的话之前。”事实上，纳赛尔在他因暴怒而冲出会议室之前说了许多话。他对谁将去进行战斗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他自己的回答没有说出口，但含意是，如果发生另一次欲争，他的阿拉伯同事们会再一次制造借口或者同以色列进行秘密交易而站在战斗之外。纳赛尔明显暗示，他的阿拉伯同事中的许多人是没有勇气的、空喊的伪君子。据法塔赫领导人说，正是在这同一次首脑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告诉纳赛尔说，他对叙利亚的虚伪极为“厌恶”，以致他正在撤回他对埃及企图和以色列达成一项政治解决一事的反对。

哈拉德进而说道：“在首脑会议之后，我们终于了解到关于纳赛尔为什么如此发怒的特殊原因。美国人已经告诉他，他们正试图改进罗杰斯计划。他们已经采纳了纳赛尔不能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观点，正要提出一个纳赛尔和侯赛因能够接受的全面的方案。换句话说，美国人已经告诉纳赛尔，第二个罗杰斯计划将要求以色列从埃及领土和两岸撤出。可是对美国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他们会有一段艰难的时间来说服以色列人接受第二个罗杰斯计划。美国人曾经要求纳赛尔帮忙，要他尽最大努力，确保拉巴特首脑会议不通过任何激进的或者反对的决议。通过海卡尔，我本人看到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两位大使的信件，要求大使尽一切办法来劝说阿拉伯领导人阻止阿拉伯激进分子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表达自己的主张，如果可能，使首脑会议延期。”

我认为，哈拉德激怒纳赛尔，大概是有计划安排的，可以这么说，是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商量后作出的，以便给法塔赫这样一个机会，向它自己的支持者表明它没有向那些要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出卖灵魂。哈拉德不得不成为做这件事的一个人，因为解放运动中激进分子正针对他及他作为法塔赫右翼领导所阐述的主张，集中火力，口诛笔伐。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较早时候曾经力图用破坏沙特在黎巴嫩的输油管道来阻挠法塔赫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在拉巴特暴发的愤怒看来在一个短时期内损害了法塔赫和纳赛尔的关系。但是，在 1970 年初，这场不和修好了。法塔赫的领导人向纳赛尔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表明他们不是他的傀儡的原因。作为回报，纳赛尔告诉他们所有他知道的关于不断发展中的和平进程。哈拉德说：“纳赛尔非常坦率，非常诚实。他说了以下的话：‘美国人曾经告诉我，我可以在任何我愿意的时刻收回西奈。但是，我对此并不在乎。问题是西岸和加沙，除非以色列人从那儿撤出，否则我将同他们媾和。’为了向我们证明他是真诚的，纳赛尔接着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并使我们十分吃惊的事情。他说，追溯到 1967 年喀土穆首脑会议时，他就曾授权侯赛因，为了使以色列人撤出西岸，他同美国人怎么干都行。”

从哈拉德告诉我的情况来看，很清楚纳赛尔为失去西岸而内疚；而这终究是埃及的将军们在向纳赛尔、以后又向侯赛因谎报战场军情后，迫使约旦卷入“六天战争”的。

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在 1970 年初有一个默契。如果巴解组织不想去破坏阿拉伯国家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和以色列媾和的尝试，如果出现了和平，巴解组织同意采取政治方式继续它的斗争，那么纳赛尔会尽一切努力说服侯赛因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自然，他们还能得到加沙。当我问哈拉德，他是否能确认，这就是实际上的默契。他答道：“是的，你是对的。但是，作为提供证据的东西，我必须说，即使我们法塔赫人也尚未想过以西岸和加沙的状况为根据来作为我们承认以色列的代价。”

由于同意和纳赛尔一起干，法塔赫领导人也必须承诺他们自己同侯赛因合作，因为纳赛尔和侯赛因两人在和平进程中是合伙者。所以，对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说他们是亲纳赛尔、反侯赛因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抗约旦政权并推翻国王，这不是也不能是法塔赫的政策。

但是，即使当法塔赫领导人告诉纳赛尔他们准备和侯赛因合作时，这很清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推翻这位国王的号召，在原则上和感情上，受到大多数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支持——包括现在法塔赫忠诚战士的大多数。在处理这一情况时，给阿拉法特增添了明显的困难，因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是，只要这位主席发话，侯赛因就能被推翻。

第一个引起我对这一事态注意的法塔赫人士是这样一个人，他 1970 年在以色列最需要索拿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名单上名列前茅。他的名字，或不如说他的斗争化名，是阿布·达乌德。在这本书里，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他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坦率他说话”。当法塔赫的一些人，在巴解组织在约旦被压垮和逐出之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时，以色列和约旦情报人士断言阿布·达乌德是被称之为“黑九月”组织的出谋划策者之一。事实上阿布·达乌德不是一个“黑九月”恐怖分子。当恐怖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组织实施一项推翻侯赛因的秘密计划——由于他在约旦被出卖并被囚

禁，这项秘密计划破产。

1970年，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在约旦的所有民兵队伍的司令员。这意味着他处于可能的最有利地位，得以了解广大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正在想什么。

“但是首先让我告诉你当时我自己的感觉，”阿布·达乌德说，“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打倒侯赛因。其次我要坦率地对你说，这不只是左翼分子和在其他游击队组织中的所谓激进分子的想法，这也是我们法塔赫的绝大多数人——战士和年轻军官——的想法和愿望。在我们当中——我现在所讲的是指法塔赫的年轻军官——我们非常认真和十分经常地讨论推翻侯赛因的问题。我们也同阿拉法特讨论我们的观点。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不采取行动反对侯赛因。我想，这是某种证明，说明我们是一个民主组织。不管怎样，阿拉法特总是说，‘不’。他对我们说，用战争来反对侯赛因或任何阿拉伯政权不是争取解放之路。”

我问阿布·达乌德，为什么他和其他人曾经如此确信侯赛因能被推翻。

“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并且由于像今天这样的形势，有许多人——我可以肯定包括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在内——宁愿真相不被泄露出去。但是，我本人认为，不再有任何理由掩盖它。

“基本的事实是：从1968年卡拉玛战斗时起直到1970年6月，我们法塔赫人受到大约50%的约旦军队的支持。在1970年6月之后，部分地由于我们运动中左翼分子的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我们开始失去这种支持。我们稍后可以说到这些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这样，在1970年6月之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机会。但是，在那以前，从卡拉玛战斗时开始，我们法塔赫人，加上那些支持我们的约旦军队，曾经有可能改变在安曼的这个政权。”

阿布·达乌德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认为指名道姓他说对我说来是明智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在1968年至1970年之间，有好几次约旦军官接近法塔赫，问我们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发动政变。有一次一位十分亲侯赛因的军官试图同哈巴什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达成一项交易，但是，这是一个圈套，当反政府的军官接近法塔赫时，他们是很认真的。但是，阿拉法特和我们的领导人总是说：‘不。’要理解这点，你必须知道约旦真实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它部分地是多次未遂政变的历史。在多次失败之后，那些想要更迭安曼政权和制度的人害怕单独行动。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合作的原因。”

据阿布·达乌德说，法塔赫及其在约旦军队中的朋友的最好时机是在1970年2月至6月期间。正如他所解释，这段时期，由于以色列的猛烈进攻，以及随后对罗杰斯计划的拒绝，这是表明以色列要继续在西岸停留下去的第一个真实证据，巴解组织和约旦的态度正在变得日益强硬。以色列人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强征在希伯伦（即哈利勒）的阿拉伯人土地，并把犹太人家庭定居在这里。对约旦军队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纳赛尔和侯赛因要乞求美国帮助其和一个蛮横的、侵略性的和彻底不妥协的以色列媾和。

假设，在法塔赫忠诚战士中，随随便便地就能找到多数人赞成与侯赛因政权交战并一直战斗到底，那么为什么法塔赫领导的不对抗政策能占上风？我向阿布·达乌德提出这个问题。他答道：“回答并不太复杂。不同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和激进团体，我们法塔赫人有一定纪律。这是

一点。另外一点是，我们是一个民主组织。从一开始我们就同意，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讨论我们的内部分歧，但是，在我们内部的会议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我们想说的意见。即使是我们最缺乏经验的战士，也可以自由地批评领导人，告诉阿拉法特他错了。因此，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准备好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且还有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法塔赫内，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转而求助于枪杆子来解决内部问题，我们将给敌人以毁灭我们的机会。”

因此，在法塔赫这个组成巴解组织的最大、最有力量的组织内，一个十分困难的情况得以控制。

在约旦进入内战前的最后的几个小时内，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越是表明他们同侯赛因合作的决心——即使他正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大力推进谋求同以色列媾和——巴解组织内的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就越加在寻找机会挑起同这位国王的军队的对抗。六月初，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约旦军队之间发生激烈战斗。如同在前几次一样，射击是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纳瓦夫·哈瓦特迈的人民民主阵线开始的。也是如同在前几次一样，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如同一个人一样共同努力来解除这场危机。差不多在后来的三个星期，当哈巴什仍在阻挠一项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已经达成的阻止进一步战斗的协议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公开斥责了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同事。“我们的群众不能再容忍一个极端主义的煽动者，他没有做任何一点改变现状的事。”他怒喝着。虽然阿拉法特没有点这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的名字，对所有人来说，这是清楚的，哈巴什就是在他心里的这位“极端主义的煽动者”。对阿拉法特来说，公开攻击一位巴解组织的同事是一件轰动的事件。这作为尺度可以用来估量这位主席日益增长的受挫和失望。

从人数来说，正如我们所见，在巴勒斯坦方面，实际从事挑衅活动的是那些积极从事解放斗争的人中的少数。但是，正是这少数人支配着事件的进程。他们得到约旦、以色列和美国的奸细的帮助，来破坏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合作的政策。早在 1968 年 11 月，侯赛因曾经说过，“更多的可能是以色列特务挑起在安曼的枪杀事件，以制造混乱，从而为以色列的攻击准备时机”。

到 6 月战斗这个时候，许多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占领了约旦的很多地方，这些在巴解组织控制下的地区，被称为国中之国。从 6 月以来，某些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的支持者，在毕竟是一个东道国中，以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可原谅的方式在行事。在许多城镇，包括安曼的部分地区，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而不是约旦政府成了行政当局。在这里，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尽其所能制造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他们设置路障，劫持车辆，向地方工商业者勒索钱财。哈瓦特迈的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支持者从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上进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广播，还强奸当地的妇女。这些就是阿布·达乌德所谈及的一些“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法塔赫的战士和支持者也不都是受欢迎的行为的模范。法塔赫也有它的流氓分子，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中的牛仔们，全副武装，到处吹牛皮，好像他们拥有这个地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总的来说，在法塔赫旗帜下服役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并不是一群无纪律的乱民。

不足奇怪，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所作所为使得解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失去那些以前曾经钦佩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约旦人、包括许多巴勒斯

坦人的支持和同情。巴解组织在这唯一的有适当的安全基地的阿拉伯前线国家，不是赢得朋友，而是在树敌。但是，还有其他的力量在同样愚蠢和粗暴的人的指挥下工作，他们决心损坏巴解组织的名誉，并破坏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合作的政策。

在六月战斗之后，一个特别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或者所谓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开始为它自己起了一个秘密的名字，它以“胜利部队”著称，它的专业是劫持汽车，经常是劫持那些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的车；绑架军官；骚扰那些在军事和政治机关工作的人的家庭。很快就清楚了，指挥这“胜利部队”的人掌握有关于这些高级军事人员行动的内部情报，当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只不过是约旦高级司令部一手制造的一个工具时，没有人为之惊讶。

那些指挥这“胜利部队”的人有两个目的。一是使那些知名的或者被怀疑为敌视约旦政权而同情法塔赫的军官，改变他们的感情。阿布·达乌德说，“那些围绕在国王周围的要压垮我们的人，正在日夜努力使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另一个更加广泛的目的是诋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信誉。如同在巴解组织年围绕阿拉法特的极端分子一样，围绕侯赛因的极端分子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内战。

6月，西方政府对一则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要杀死侯赛因的图谋表示义愤。据阿布·伊亚德说，并没有这种图谋。他告诉我：“子弹打在侯赛因的轿车上，这是真的——但是，这位国王不在车内。而且这些子弹不是巴勒斯坦人发射的，是伪装成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约旦军官发射的，他们的上级随后赶紧跑到这位国王面前，告诉他曾经有一个杀害他的图谋，幸好他当时没有乘坐这辆汽车！”

“那些出主意伪造暗杀企图的人的看法是，侯赛因不够强硬，反巴勒斯坦人的劲头也不足。他们正促使他就像他们自己那样强烈憎恨巴勒斯坦人。”

阿布·伊亚德具备了解这一事情的最好条件。它是巴解组织各种情报机构执行负责人，在内战前还同侯赛因保持着极佳的友好关系。在内战前，阿布·伊亚德实际上是法塔赫领导成员中最亲近侯赛因的人。他参加了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阿拉法特同这位国王的会晤；当有些事情要和侯赛因打交道，而阿拉法特又不能出席时，阿布·伊亚德代表这位主席。

侯赛因本人不了解谁是这“胜利部队”的幕后人，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一点也未卷入低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信誉的秘密计划中。他至少像阿拉法特一样急于避免一场内战。有时侯赛因也感到激怒，因为阿拉法特明显的不愿使用武力来制服他自己的极端分子；但是，当侯赛因对自己说真话的时候，当他为阿拉法特设身处地考虑时，他对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不得不感到有些同情。侯赛因毕竟是国王。他有一个国家，而且所有国家机构都在他的统帅之下——这是在理论上这样说。但是，仍然是这位国王，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极端分子。那么，对阿拉法特来说，那又是多么大的困难呢？这个想法经常在侯赛因心里盘旋，他不止一次地同阿布·伊亚德讨论此事。

根据阿布·伊亚德和法塔赫其他领导人所谈以及我自己在约旦、以色列和西欧的详细调查，以色列的代理人应对某些事件负责。这些事件使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被人憎恨，并且为内战的发生设置了舞台。在多数情况下，以色列的代理人是一些曾经受到这种或那种讹诈而被改变了立场的